

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互通新论

——以物理之学为研究视角

周云逸

[摘要]宋代理学家认为医学是“小道”，但他们也承认医学有“一物之理”。“理”正是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互通的基础。从宋代物理之学这一崭新视角，论述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对天人关系、对人体、对药物的各自认识，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剔除附加在中医学之上的道德伦理、谶纬迷信因素。把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这是宋代理学相对于宋代中医学而言，可以提供的最大意义和价值所在。宋代中医学对宋代理学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启发上。

[关键词]宋代理学；宋代中医学；互通；物理之学

中图分类号：B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4)01—0070—06

作者简介：周云逸(1975—)，女，贵州贵阳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宋代科技史研究。河北保定 071002

理学与中医学互通问题，是中医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点，常存库、姚春鹏、程雅君等人有一些研究成果^①，但都是从宋代理学对后世医学的影响角度立论，宋代理学对于宋代中医学的当时影响，则不多见。由于认识的误区，有研究者将宋代“格物致知”论中的“物”视为“儒家的封建道德而非科学实践”^[1] (P.586)，这是对宋代理学研究范围的割裂与缩小。宋代理学除了义理之学、性命之学，还有物理之学，宋代理学家李之才与邵雍对问时即已明确了这一点。物理之学，是探索物质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长期以来，宋代理学三个构件中物理之学未受重视^[2]，这不利于对宋代理学的整体研判。从宋代物理之学这一崭新视角，探讨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的内在联系，将有助于厘清宋代中医学面临的思想资源问题。

一、宋代理学家对中医学的基本认识

朱熹认为医学是“小道”^[3] (P.188)，医生是“贱役”^[3] (P.147)。对此，古往今来的学者多有批评，但大多没有理解朱熹之用心。明代医家张介宾强调“医非小道”^[4] (P.75)， “为人不可不知医，以命为重也”^[5] (P.439)。清代医家章楠说“奈何自朱子称医为贱役，世俗忘其为性命所系而轻贱之，惟富贵是重。至于性命既危，而富贵安保？”^[6] (P.187) 张介宾、章楠对朱熹的理解是片面的。朱熹《四书或问》对

于为何认定医学是小道，进行了辩证的说明：

或问：何以言小道之为农圃、医卜、技巧之属也？曰：小者对大之名。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专一家之业以治于人，道之小者也。然是皆用于世而不可无者，其始固皆圣人之作，而各有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观也。然能于此者，或不能于彼，而皆不可以达于君子之大道，是以致远恐泥，而君子不为也。^[7] (P.396—397)

朱熹指出相对于正心修身这个大道而言，医学就是小道，但医学也有“一物之理”，也是“必有可观”的。致力于医学会分散人的精力，影响对于大道的体悟，所以说掌握医学知识是必要的，但花太多精力在医学上，则是君子不为的。

由此可以看出，以往对于朱熹称医学为小道的批判，实际没有全面关照朱熹的逻辑。朱熹的观点是有特定语境的，相对于天理来说，医道当然是小道。儒家自孔孟以来，强调“朝闻道，夕死可矣”，“舍生而取义”，对道的追寻是他们的最高理想。正是从这个层面，北宋理学家张载说“医书虽圣人存此，亦不须大段学，不会亦不甚害事，会得不过惠及骨肉间，延得顷刻之生，决无长生之理，若穷理尽性则自会得。”^[8] (P.278) 在张载看来，医学延长的不过是人的顷刻生命，相对于“立德”这一人生不朽价值的追求而言，不学医也不害事。

张载认为只要能够穷理尽性,自然会懂得养生之理。朱熹虽然称医学是小道,这并不代表他轻视生命,“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9] (P. 4297)},可见朱熹对医道的重视。朱熹有《送夏医序》《跋郭长阳医书》^②,对古代经方、诊脉部位、用药之道见解独到。

北宋理学家程颢的幼女澶娘^{[10] (P. 501)}及程颐的一位侄女^{[10] (P. 612)}均因庸医误治而亡,由这些血的教训,二程提出了对中医学的理学要求:医家应当明理“如处药治病,亦只是一个理。此药治个如何气,有此病服之即应,若理不契,则药不应。”^{[10] (P. 52)}医家开药治病,应当遵循“理”,理不契合,则药不应验。程颐认为庸医乱治人病,“与操刃而断其喉何异?”^{[10] (P. 612)}要求惩治庸医。

宋代理学家从知医为孝的角度强调掌握中医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起因于对庸医的不信任。程颢说“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10] (P. 428)}程颐则认为事亲学医“最是大事”,要懂一点医学知识,以免被庸医所误“必须识医药之道理,别病是如何,药当如何,……如自己曾学,令医者说道理,便自见得,或已有所见,亦可说与他商量。”^{[10] (P. 245)}二程强调“知医”是在“事亲”这个层面来说的,将中医学视为服务于道德伦理的工具。中医学上被誉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将其医学著作命名为《儒门事亲》,正是受这种思想影响所致。知医为孝固然是宋代理学与中医学相联系的一个方面,但仅是次要联系,且道德伦理的附加意义并不利于突出中医学的科学属性。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更为重要的联系是通过宋代物理之学这个中介达成的。

二、“理”: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互通的基础

宋代理学家“格物致知”,探求“物理之学”,他们对“理”的追寻是不言自明的。周敦颐认为:“一阴一阳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谓也。”^{[11] (P. 75)}“圣人之所以圣,不过全此实理而已,即所谓太极者也。”^{[11] (P. 79)}。二程提出“天下只有一个理”^{[10] (P. 196)}，“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10] (P. 30)}，“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10] (P. 3)}，“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10] (P. 21)}。张载解释道德二字不离于“理”，所谓“循天下之理之谓道，得天下之理之谓德”^{[8] (P. 32)}。又说“烛天理如向明，万象无所隐”^{[8] (P. 26)}，“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8] (P. 321)}。朱熹强调“格物致知，以尽事

物之理”^{[7] (P. 3)}。他区分了格物致知与博物洽闻，前者“以反身穷理为主”，对事物“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极至”；而后者“以徇外夸多为务，而不核其表里真妄之实”^{[7] (P. 28)}。宋代理学家“格物致知”不是简单地以博物洽闻为目的，对规律、本质的探究才是其根本目的。

沈括虽非理学家，却是宋代探究物理之学最为成功的代表之一。朱熹颇为推崇沈括，他将沈括的许多科学发现援引为理学的证据。比如关于月亮盈亏问题，朱熹采用了沈括的说法“故唯近世沈括之说，乃为得之。盖括之言曰‘月本无光，犹一银丸，日耀之乃光耳。’”^{[12] (P. 53)}朱熹对地形地貌中沧海变桑田现象，有较为科学的认识“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是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13] (P. 2367)}

宋代医家同样重视“理”，因为疾病的形成和治疗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治疗疾病要先明理，治疗合“理”，则重病能变轻；若治疗不得理，则轻病会变重病。宋代医家董汲指出“若疗之违法，虽轻亦重，疗之得理，虽重亦轻。”^{[14] (P. 6)}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也指出“疗之合理，病无不痊。”^{[15] (P. 414)}宋徽宗曾撰《圣济经》10卷，以理学思想论述医学理论。宋代医学家对于治疗不合“理”，多有批评。韩祗和《伤寒微旨论》批评医家不明白脉尺寸有“阴阳虚盛之理”，“往往变伤寒为坏病焉”^{[16] (P. 3)}；批评医家对病人“不询其端由，亦不详其脉理”^{[16] (P. 8)}，妄投药将病人治死。正因为中医学蕴藏着“理”，所以宋代理学家喜欢“以医为喻”来说明道理。程颢说“切脉最可体仁。”^{[10] (P. 59)}二程多次以医为喻说明仁的内涵，“医家言四体不仁，最能体仁之名也。”^{[10] (P. 120)}“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10] (P. 33)}“医书有以手足风顽谓之四体不仁，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与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无恩者，其自弃亦若是而已。”^{[10] (P. 74)}

朱熹则喜欢“以医为喻”来说明读书的要义。朱熹《答吕子约》认为“所读书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众医杂进，百药交下，决无见效之理，不若尽力一书，令其反复通透，而复易一书之为愈，盖不惟专力易见功夫，且是心定不杂，于涵养之功亦有助也。”^{[9] (P. 2264-2265)}读书太杂，好比众医杂进，百药交下，是不可能见效的，朱熹提倡读书要将每本

书反复读透。朱熹还提出“今读书紧要是要看圣人教人做工夫处是如何,如用药治病,须看这病是如何发,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何药材,何者几两,何者几分,如何炮,如何炙,如何制,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吃,只如此而已。”^{[13] (P.162)}治病要细看药方的成分、份量及炮、炙、制、切、煎、吃的方法;而读书也应当如用药治病一般细致体会圣人之用心。

宋代中医学家遵循医理的医学实践给宋代理学家提供了悟道的契机。朱熹《送夏医序》:“予尝病世之为论者皆以为天下之事宜于今者不必根于古,谐于俗者不必本于经。及观夏君之医,而又有以知其决不然也。盖夏君之医,处方用药奇怪绝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验。及问其所以然者,则皆据经考古而未尝无所自也。予于是窃有感焉,因书遗之,以信其术于当世,又以风吾党之不师古而自用者云。”^{[9] (P.3964)}由此可知,朱熹得出的理学家应该“师古”、尊经的结论是从夏医的治病中“窃有感焉”的结果。

三、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互通的主要表现

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互通的表现是多方面的,现以宋代物理之学为视角,论述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对天人关系、人体、药物的认识。

(一) 对天人关系的认识

人体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是相通的,因为人本就是兼天地之气而生。这一点,宋代理学家与宋代医学家的认识是一致的。程颐认为“人乃五行之秀气,此是天地清明纯粹气所生也。”^{[10] (P.199)}宋代医家刘温舒认为“夫人禀天地冲和之气,受五行生化之形,阴阳刚柔萃于一身,为万物之灵通。”^{[17] (卷下《论手足经》)}

相对于汉儒以讖纬神学强调天人交感,宋儒以物理之学的精神论述天人关系,则更显科学。张载认为儒者凭借聪明才智(“明”)可以认识自然规律(“诚”),即“因明致诚”;而认识自然规律又可以使人聪明,即“因诚致明”,所以“诚”“明”相辅相成,即“天人合一”^{[8] (P.65)}。这是从人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角度,强调“天人合一”,已然剔除了汉儒讖纬迷信的因素。二程对汉儒的天人附会之说进行了批判“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胜,则天不为灾;人事不胜,则天为灾。人事常随天理,天变非应人事。如祈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气壮,则不为疾;气羸弱,则必有疾。非天固欲为害,人事德不胜也。如汉儒之学,皆牵合附会,不

可信。”^{[10] (P.374)}二程肯定了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之处,认为人事常随天理变化,而天变却不对应人事变化;他们还以疾病的产生为例,指出外在在大宇宙的“祈寒暑雨”对人体小宇宙会有影响,人气壮则不会生病,但如果人“气羸弱,则必有疾”^{[10] (P.374)}。这显然不同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更为客观。

宋代中医学重视大宇宙对小宇宙的影响,从宋代的医科考试可以明显看出。宋代医科考试中墨义第一道题就是“问: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18] (P.12)}宋代医科考试的六个部分就有两个是考察大宇宙对小宇宙的影响,即“三曰大义,试以天地之奥与脏腑之源”,“六曰运气,试以一岁阴阳客主与人身感应之理”^{[19] (P.866)}。

人体内在脏腑经络与外在自然存在对应关系,《黄帝内经·素问》已有“五运”“六气”^③之说,建立起了五脏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宋代医家发展了《黄帝内经》的观点,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深入的论述。宋代医家王旼指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是以有五藏六府,四肢十二经,三百六十五穴,以象五运六气,四时十二月周天之度。阴阳变化,与天地同流。乖其气,逆其理,则阴阳交错,府藏偏毗,脉行迟速,荣卫失度,百病从生。”^{[20] (P.13)}人的五脏、六腑、四肢、十二经、三百六十五穴分别对应的是大宇宙中的五运、六气、四时、十二月、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宋代中医学即是沿着大宇宙对于小宇宙的影响这一思路,研究疾病的形成及疾病治疗的路径。宋代医家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指出:

夫人禀天地阴阳而生者,盖天有六气,人以三阴三阳而上奉之;地有五行,人以五藏六腑而下应之,于是资生皮肉、筋骨、精髓、血脉、四肢、九窍、毛发、齿牙、唇舌,总而成体。外则气血循环,流注经络,喜伤六淫,内则精神魂魄志意思,喜伤七情。六淫者,寒、暑、燥、湿、风、热是。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若将护得宜,怡然安泰;役冒非理,百病生焉。^{[21] (P.19)}

陈言认为人体由于受到寒、暑、燥、湿、风、热“六淫”的影响,从而产生了疾病,并开出五运太过、不及和六气司天所致病症的16首方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用五运学说解释龙齿、虎睛的药效。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研究运气规律,预测疾病的发生并指导临床。陈直《寿亲养老新书》认为“五脏本于五行”,因此“顺五行之气者,以相生之物为药,以养之;逆五行之气者,以相胜

之物为药,以攻之”^{[22] (P. 32-33)},“人能执天道生杀之理,法四时运用而行,自然疾病不生,长年可保”^{[22] (P. 10)}。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认为“夫人将摄顺理,则血气调和,风、寒、暑、湿不能为害。”^{[23] (P. 158)}

宋代物理之学对于医学中的天人关系有更为辩证科学的认识。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象数一》指出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24] (P. 85)},就大宇宙而言,气候的变化都有一定规律可循;就小宇宙而言,人的疾病受到大宇宙的影响,致病的原因既遵循着一般规律,又要考虑到具体的时间、地点、气候等变因的影响。沈括举例说,假如“厥阴用事,其气多风,民病湿泄”^{[24] (P. 85)},这固然是一般的规律,但是不同地方有不同气候,就算是同一邑气候都随时有变,“岂溥天之下皆多风,溥天之民皆病湿泄耶?”^{[24] (P. 85)}沈括以预测天气为例,说明了对于疾病的治疗应该“随其所变,疾厉应之,皆视当时当处之候”^{[24] (P. 85)}。

(二) 对人体的认识

物理之学既探究外在自然规律,又研究人体内在规律。朱熹认为人心有形上形下之分,形下的人心是“肺肝五脏之心”,这是可以用药补的;而形上之心是“操舍存亡之心”^{[13] (P. 87)}则不能用药补。朱熹《跋郭长阳医书》:

抑予尝谓古人之于脉,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关尺之法为最要。且其说具于《难经》之首篇,则亦非下俚俗说也。故郭公此书备载其语,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释之。夫《难经》则至矣,至于德用之法,则予窃意诊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长短,以是相求,或未得为定论也。^{[9] (P. 4297-4298)}

朱熹指出察脉的寸关尺之法最重要,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释之,是不妥帖的,因为人的手臂肥瘠、长短各异。这些反映出朱熹对人体的科学而辩证的认识。

二程认为必须了解人体的构造:

人有寿考者,其气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人脉起于阳明,周旋而下,至于两气口,自然匀长,故于此视脉。又一道自头而下,至足大冲,亦如气口。此等事最切于身,然而人安然恬于不知。至如人有人问“你身上有几条骨头,血脉如何行动,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晓。今人于家里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问著,已不能知,却知为不智,于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

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备,甚物是没底?背在上故为阳,胸在下故为阴,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10] (P. 54)}

在二程眼中,人身上有几条骨头、血脉、脏腑,这是必须了解的,“此等事最切于身”,否则便如同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家活屋舍”,是不智的表现。二程认为足大冲,即“太冲”穴,也是诊脉部位,这是《黄帝内经·素问》中提出的“三部九候”^{[25] (P. 182)}遍身诊脉法。二程对《黄帝内经》确有研究,认为“《素问》之书,必出于战国之末,观其气象知之。……然善言亦多。”^{[10] (P. 167)}

中医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是人体的疾病问题,因此必然探究人体内在的规律。宋代医家王惟一铸造的针灸铜人,将人体丰富的经络和穴位客观地呈现出来。宋代出现了人体解剖图《欧希范五脏图》《存真环中图》,将人体的五脏位置形状等绘制出来,这表明宋代中医学对人体的认识达到了精细的程度。钱乙将儿科从中医中独立出来,陈自明使妇产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说明宋代人对人体的研究更加细密更加科学^[2]。宋代理学家也认为宋代医学家对于人体的研究是可取的,比如张载指出“医谓饥梦取,饱梦与,凡寤梦所感,专语气于五藏之变,容有取焉尔。”^{[8] (P. 20)}

沈括以一个自然科学家的眼光来看待中医学,他以探求自然科学规律的精神对宋代中医学进行了批判。比如,他对于《欧希范五脏图》所谓“三喉”(食喉、水喉、气喉)的描绘,进行了纠正,提出了“二喉”说,指出“水与食同咽,岂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24] (P. 262)}。沈括的“二喉”说打破了宋代医学对于“三喉”说的迷信。再如,古方言“云母粗服,则著人肝肺不可去”^{[24] (P. 262)}沈括指出,这种说法纯属荒谬,他从人体解剖学的角度指出“人之饮食药饵,但自咽入肠胃,何尝能至五脏?”^{[24] (P. 262)}“凡所谓某物入肝,某物入肾之类,但气味到彼耳,凡质岂能至彼哉?此医不可不知也。”^{[24] (P. 262)}沈括的这些说法是非常具有科学精神的,体现了他作为自然科学家探求物理的精神,这对于传统中医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 对药物的认识

对药物的研究是宋代中医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宋代医家认为药物的颜色与五行相关,故而又与五脏有关。宋徽宗《圣济经》卷九《药理篇》虽然沿袭了《神农本草经》的观点,但指出药物的

颜色通于五脏是“自然之理”^[26](P.169)却是赵佶的贡献。但这种“脏法五行,色通五脏”的认识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律,因其很容易被证伪。比如灵砂、桂心等药物色赤,能治心脏病,但麦门冬、远志并非赤色,也是治心之药。宋代医学对此已有辩证阐释,宋代《太医局诸科程文格》认为“丹砂法火主心之说,实取其材性之能,因以五行而附会尔。用药之法,诚不必泥可也。”^[18](P.30)宋代医家唐慎微《证类本草》记载1746种药物的性味、功效、主治,比唐代《新修本草》所记载850种药物多了一倍有余。

宋代物理之学对各种动植物、矿物的形状、性能的研究,其中必然包含对药物的研究。二程认为:

医者不谙理,则处方论药不尽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后,其性又如何?假如诃子黄、白矾白,合之而成黑,黑见则黄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为三,三见则一二亡,离而为一二则三亡。既成三,又求一与二;既成黑,又求黄与白,则是不知物性。古之人穷尽物理,则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则成何性。^[10](P.162)

二程认为医者要通过食味、辨色等手段了解单味药的性质,也要了解药物合成方剂后的性能与功效,这样用药才能符合“理”。

从术业有专攻的角度来说,宋代理学家对药物的研究在整体上难以达到宋代医学家的深度,但在某些方面,宋代物理之学又纠正了传统医学不少谬误。二程对神农尝百草提出质疑“神农作《本草》,古传一日食药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当尝;若大毒,一尝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视色嗅味,知得是甚气,作此药,便可攻此病。须是学至此,则知自至此。”^[10](P.58)二程认为是神农观察药物的色、嗅、味,从而认识药性,这是理学家对神农“一日食药七十死”的质疑,用“理”推理还原神农认识药物的过程。又比如传统医学中强调采药在二月八月,沈括指出这种观点荒谬,他认为物性、地气、人力的不同,会影响到药物的生长,因此,采药“岂可一切拘以定月哉?”^[24](P.265)

结论

从大的历史时期来看,理学对医学的影响是存在的,金元四大家的医理思想莫不受到宋代理学影响。但就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而言,则难于从时间上判断二者相互影响的顺序。只能说,

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面临着共同的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因而对某些问题产生了大致相近的认识。

就“理”而言,中医学本身就追求规律,《黄帝内经·素问》已提倡医家“穷其至理”^[25](P.561),既研究切脉之理,也研究针刺之理。因而宋代中医学并不是受宋代理学影响才开始追求医理。但宋代理学强调“理”,对宋代中医学会有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非常内在的,多是以一种语境的形式存在。在《四库全书》中,宋代医籍中“理”字出现了1312次,而宋代以前医籍中“理”字出现了920次。这意味着宋代医籍中“理”字出现的次数超过了前代的总和。这表明在宋代理学倡导“理”的氛围中,宋代医家对医理有了更为自觉的追求。另一方面,宋代中医学对宋代理学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前者对后者的启发上。宋代理学家喜欢“以医为喻”,利用医学打比喻来说明宋代理学中的道理。此外,宋代医学家的医学实践也给宋代理学家提供了悟道的契机。

综上,我们认为以宋代物理之学为视角,揭示宋代理学与宋代中医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利于剔除附加在中医学之上的道德伦理、讖纬迷信因素。把中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这是宋代理学相对于宋代中医学而言,可以提供的最大意义和价值所在。

注释:

①参见常存库《理学对中医的影响和作用》(上、下)(载《朱子学刊》1991年总第3辑、总第4辑);姚春鹏《理学格物致知对后期中医学发展的影响》(《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7年第6期);刘鹏《理学对中医影响之再评价》(山东中医药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程雅君《援“理”入医,医“理”圆融——以朱熹等中医哲学思想为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张巧霞《二程理学的基本观点在中医学中的体现》(《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②学界不少人认为《跋郭长阳医书》《伤寒补亡论跋》是朱熹的两篇文章,其实是误解。《伤寒补亡论跋》即《跋郭长阳医书》。《伤寒补亡论》的作者郭雍,号冲晦,长阳人,可知郭雍即郭长阳。郭雍是周敦颐的三传弟子,长于理学兼通医学。朱熹有《与郭冲晦》,朱、郭在易学上有辩论。

③五运指金运、木运、水运、火运、土运;六气指风、热、湿、火、燥、寒六种气象。以五运说明五脏的生克关系,以六气的反常变化说明致病的原因,并由此推断每年气候变化与疾病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程雅君. 中医哲学史[M]. 成都: 巴蜀书社, 2010.
[2]姜锡东. 宋代真理学的构件和后世的取舍[J]. 河北大学

学报(哲社版) 2010(5).

-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明)张介宾.景岳全书(上册)[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
- [5](明)张介宾.类经图翼[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 [6](清)章楠.医门棒喝[M].文泉,晋生点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
- [7](宋)朱熹.四书或问[M].黄坤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8](宋)张载.张载集[M].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8.
- [9](宋)朱熹.朱熹集[M].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 [10](宋)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1](宋)周敦颐.周濂溪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2](宋)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3](宋)朱熹.朱子语类[M].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4](宋)董汲.董汲医学论著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 [15](宋)太平惠民和剂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刘景源

点校.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 [16](宋)韩祗和.伤寒微旨论[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宋)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M].上海:上海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本.
- [18]李顺保.宋太医局诸科程文格注释[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 [19](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0](宋)王冕.全生指迷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 [21](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
- [22](宋)陈直.寿亲养老新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
- [23](宋)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
- [24]胡道静.新校正梦溪笔谈[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5.
- [25]牛兵占.黄帝内经素问译注[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
- [26](宋)赵佶.圣济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收稿日期:2013-10-20 责任编辑 尹邦志